

# 古今比较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 ——对当前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

廉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 要** 通过古今比较,当前中国史学理论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化;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对应概念。这些问题既阻隔了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又不利于中国史学理论走出一条反映中国事实的道路。为未来计,应将中国传统史学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并借鉴外来史学理论,支持中国史学的建设。

**关键词** 中国传统史学 史学理论 理论资源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9)05-0015-10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9.05.002

当前,中国的史学理论主要得益于对外来史学理论的吸收。它肇始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与借鉴。梁启超的“史界革命”<sup>[1]</sup>堪称吹响这一史学进程的号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近现代史学成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沉潜。中国史学近代化之初即以贬抑中国传统史学为代价,梁启超对旧史学“四蔽”“二病”<sup>[2]</sup>的批评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可以说,这种局面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百余年来,中国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sup>①</sup>。随着研究的深入,业已发掘的中国传统史学在理论方面已经日益呈现出与当前史学理论(基本上外来史学理论)相对不同的独立气质。将两种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若干理论精华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当前中国史学理论存在的某些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获得解决这些理论问题的若干启示。本文尝试从概念、整体性、价值观三个层面就此作出下述论析。

### 一、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内涵的抽象的概括性的表达<sup>②</sup>。概念需要反映它所概括的事物。如果考察现在使用的史学概念,我们发现,有些概念更便于反映西方的历史传统,有些概念甚或也可以涵盖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些史学现象,但多与中国传统史学十分隔膜,且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不良的遮蔽作用。

以“历史”为例。今天谈史学,则往往不能不从“历史”这一概念谈起。而对“历史”这一概念的解释,通常会注意到两种含义:“历史”一词在中文、西文中都有两重内涵,一是常识意义上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二是对这些事情的记载、考订、描述和解释。”<sup>[2]47</sup>这是一种两分式的理解,它往往还被表达为:“客观历史”与“主观历史”,“过去的事情”与“历史书写”,等等。这种理解与表达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向西方学习的结

收稿日期 2019-05-15

作者简介 廉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①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一文中表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成就表现在8个方面,其中的第五方面即“研究和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其他几项依次是:理论、方法论研究,历史撰述,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成果,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②《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concept”:“idea underlying a class of things; general notion. 一类事物的基本观念,概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9页。

果。在这里，“历史”仅仅是“history”的译语。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history”一词的确具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历史书写”两种语义<sup>①</sup>。

不过，这一概念及解释和我国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相符。第一，从词语的角度看，“历史”在汉语的历史语境中至少存在过四种含义：过去事实的记载；经历；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学科<sup>[3]362</sup>。上述对“历史”的解释至少忽略了第二、第四种情形。因此，不能说在中文中“历史”只有“两重内涵”；只能说，作为译语，“历史”有“两重内涵”。可以说，作为译语的汉词“历史”缩减了其在原生语境中生长出来的多重语义。第二，从更为重要的、概念的角度，作为当代史学基本范畴之一的“历史”，在我国传统史学中很少作为一个范畴出现，而更具有范畴性质的，恐怕非“史”莫属。

“史”与“历史”在内涵上存在不小的差异。从汉字的角度，“史”比“历史”的义项更丰富：古官名；史册、历史；虚饰、浮夸；画师；《史记》的省称；通“使”；姓<sup>[4]48</sup>。从范畴的角度，相较于“历史”概念的两重内涵，有学者表示，“中国古人对历史还有一种三分法，而且是源远流长，更具深意”<sup>[5]69</sup>。这里所讲的“三分法”，乃指事、文、义而言。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范畴，其衍生内涵还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笔、史裁、史法、史例、史评、史传等等。这些我们今天还在一定领域使用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史”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丰富的生命力正是“史”作为一个范畴的充分体现，是中国传统思想所具有的抽象概括能力的充分体现。这是“历史”这一概念所不具备的。“历史”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类似的深厚的根基，它无法呈现出一定的思想体系，仿佛中国传统史学没有能力创造出高级的抽象概念。这里潜藏着误导。“历史”这一概念虽非有意，却在无形中遮蔽了中国传统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及其内在联系。正是由此，学者才希望“寻本溯源”，尝

试辨析“历史”与“史学”两个概念<sup>[6]8</sup>。

如果采用“历史”这一概念以及对它的两分式解释而忽略“史”之概念属性及其多样性内涵，则一方面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削足适履，以适应这样的两分式思考框架，另一方面又忽视了我国的史学传统，无形中使我们与传统更为疏远。相反，如果我们对自已的史学传统持有更为自觉的尊重意识与学习态度，我们对史学的思考将会主动得多、开阔得多。

再以“公共史学”为例（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公众史学”、“大众史学”、“通俗史学”等等）。

有关“公共史学”及其理论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虽然有关概念、定义、内涵等还在讨论中<sup>②</sup>，但已有学者呼吁“在中国史学会下面设立一个公共史学会的二级分会，还可以设立一个公共史学奖”<sup>[7]</sup>。综观有关讨论，除对西方的公共史学及其理论加以研究之外，其他多数讨论都将重心放在如何在我国推行、发展公共史学，俨然已把“公共史学”视为我国史学的未来。然而，对于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中国，则讨论得并不充分<sup>③</sup>。

“公共史学”这一理论意在倡导更多的、不同身份或者不同地位的人能够参与到史学建设中来（而不仅仅是“学者”、“专业学者”或“史学工作者”等）：“公众史学是‘大众之学’，本质上是史学的社会化或史学的大众化，这意味着公众参与、书写公众、公众消费三大方向的变革。”<sup>[8]41</sup>果真如此，则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史学本来就存在这样的、至少是类似的传统：在古代史学中，上层有国史编撰、中层有地方志、民间则有家谱与传记，传记中也不只是帝王将相，还有货殖、游侠、列女等，撰史者也不单纯是专业史家，还有官员、普通的读书人（包括女子）、民间的口耳相传等，而“民为重，君为轻”、“经世致用”等更是古代史学突出的思想意识；在近代史学中，则有“新史学”对“群体”的关注；在现代史学中，则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广大人民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厂史、村史

①《大英百科全书》解释“历史”词条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或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张广智先生为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作序时曾经提到：“在这里，不容我们对‘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抑或‘大众史学’之名细作辨析，《通论》却给人们下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这或许有争议，正如他所说：‘因为公众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概念，所以要想一句话说明清楚，真的好不容易。’不说也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③目前，仅见个别学者对此有所讨论。例如，有文章曾从西方史学理论的角度提出怀疑：“中国近代社会是否有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仍有争议。”（王天根《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第11页）

的编写,等等。基于这些史学传统,再来看“公共史学”,则不能不产生如下疑问:如果单单是希望更为广泛的参与,那么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与经验,何需引进“公共史学”?如果过去的史学实践在理论上有所不足,那么引进“公共史学”的新意又在哪里?在我国推行“公共史学”的史学基础是什么?“公共史学”与我国既有的类似理论有何异同?……这些问题无疑将深化我们对“公共史学”的思考,但这些思考目前还鲜见于“公共史学”的讨论中<sup>①</sup>。

在此,我们不便于展开来讨论这些问题,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具有意义。问题的提出得益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以及古今联系与比较。我们需要对传统保持自觉意识,尤其在引入外来概念之时。目前看来,中国史学与大众之间相联系的传统已被“公共史学”这一理论屏蔽,仿佛中国史学缺乏对公众的关心;同时,由于失去了相关理论比较,又制约了我们对西方“公共史学”真正价值的理解。这于中、于西都不是一种公正、科学的态度。

又如“近世”、“近代”等概念。有学者研究国外“近世”、“近代”(“modern”或“modern time”和“modern age”)等时间概念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时,曾经这样对比中国古代史学的分期观念:“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近代史无一不是以王朝兴衰更迭为基本内容,传统近代史惯以朝代名入书名,二十四史无不如此”<sup>[9]63</sup>。其意以为,中国古代常见以断代为名的史书,而鲜用“近世”或“近代”作为书名,故不及近代以来的史学进步。这是梁启超“反对以朝代为时间单位书写历史”的思想遗绪<sup>[9]57</sup>。遗憾的是,时过境迁。随着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分期意识应当具有新的认识。须知,我国古代史学不止于以朝代冠名的二十四史(何况其中的《史记》并非以朝代命名),还有《尚书》《春秋》《通鉴》《通典》《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等不以朝代命名的史书。就体例而言,“断代为史”固然是我国古代的史体之一,但是就连推崇“断代为史”的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也认为,史学实际上存在“六家”<sup>[10]3</sup>,即六种史体。就历史思想而言,上古、中古、近古之类的历史分期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超越“断代”叙事的宏观的历史认识,是“会通”精神的一种体现,

也是观察“世变”的一种方式。孔子已有“大同”与“小康”<sup>[11]875,876</sup>、“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sup>[12]408,409</sup>等分期认识。《商君书·开塞》亦有言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sup>[13]84</sup>而二十四史之中的《史记》,其创作宗旨之一亦为“通古今之变”<sup>[14]2735</sup>。明代则不少文字“表达了明人对世道变化的觉察与关注”<sup>[15]108</sup>,邱濬《世史正纲》就是为“志世变”而编纂的一部通史<sup>[16]156</sup>。可以说,我国传统史学对历史分期的认识是悠久且多样的,只是在断限、对时代特点的把握以及重视程度上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动而已。这也是历史分期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史学的分期意识未见得落后于西方。应当说,“近世”、“近代”意识是以通史视野为前提的,与其和断代、朝代相比,不如与中国古代的通史观念进行比较,更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近世”或“近代”词语的使用。由此,我们认为,如果希望将中西史学联系起来认识,就必须更加谨慎,争取对中西史学都有足够的了解,避免简单对比、轻率断论,更要警惕以西方史学裁量中国史学。

虽然存在上述西方史学概念遮蔽中国史学内涵的现象,但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注定因异质而无法沟通。如果在学习国外史学的同时兼具本土史学意识,则能令东西方史学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刘家先生的研究堪称范例。刘先生在学术上中西兼通,他的研究成果往往既具有西方的学术视野,又能光大中国的学术传统。以他翻译“tradition”与“traditions”为例。为了寻求贴切的汉语译文,刘先生仔细考察了相关词语在各自语境中的真实所指。他发现,在英语语境中,“tradition”表示抽象的“传承过程本身,或传承之流”,而“traditions”则表示“世代流传的具体风俗、习惯、信仰、思想、制度等等”;同时,在汉语语境中,“传统”一词是指“帝王之位的传承”,而“传承”涉及的是“行为过程或一般性”。因此,他主张“以‘传承’对译 tradition 之不可数形式,而以‘传统’对译其可数形式”<sup>[17]58-59</sup>。这样,刘先生便将英文语境中的“tradition”及“traditions”妥妥地翻译给中国语境中的读者,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了“传统”(或传承)在中英文语境中的实际意义,有利于引导读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外思想传统

<sup>①</sup>只有个别学者将公共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作过这样的联系:“中国的公众史学来源,远的可以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寻找。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线索,一是史学的通俗化,二是史学的民间化。”(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可视为一家之言。

的异同。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中外史学思想的交流与沟通,促进我们的史学认识真正获得发展。如果一律照本宣科地译成“传统”,或随意对译,而不顾外语与译语的历史语境及文化背景,无疑会在不知不觉中混淆这些词语(尤其是作为概念或者范畴)所牵涉的学术脉络与文化传统,而在实际上造成语意混乱的后果,使读者无法发现此处暗含的中西文化异同。由此可见,面对中西不同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及理论,作为中介的翻译者、研究者是否具有自觉的本土语境与文化意识、如何兼顾史学所牵涉的不同文化,将成为史识高下的关键。可以说,文化决定史学。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史学“取决于史学在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和角色”<sup>[18]</sup>。

聊举数例意欲表明,借鉴外国史学须时刻保持本土文化自觉,否则将导致现代认识与传统认识、西方理论与东方思想之间的隔膜与混乱,反而有违学习与借鉴、继承与发展的初衷。

##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化

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日益深入,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深刻的整体性也随之日益有所呈现。这种整体性展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思想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展示出中国传统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有机的结构,其样貌与今天的历史学非常不同。近年,有学者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意识到这一点<sup>①</sup>。不过,有关认识仍有待提高。这里仅以数例来管窥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以及这种整体性对于当前史学理论的启发。

以中国传统“史论”为例。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常以“某某曰”的形式附缀于编年体、纪传体等史书的行文之间,其独立形态反而显得微弱,学者亦多不看重。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理

论”<sup>②</sup>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史论遗产时,我们意外地发现,除却对历史的理论思维值得发掘之外,中国古代史论还呈现出“历史理论”无法尽数容纳的其他内容:中国古代史论具有逐渐稳定、并有所发展的形式——“史论”,它包含一系列相对稳定、并且有重大意义的命题,它具有上及于“天”(类似于历史哲学)、下探于人事(即具体历史)、旁及思想方法等相当完善的思考层次,它很早便提出了自己的“义理”(相当于今天所讲的理论指导),它还与中国史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史学之外的经、子、集形成了有机的联系;它呈现出无法割断的历史承继性……总而言之,它体现出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内涵颇为丰富的整体性面貌,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sup>[15]</sup>。由“历史理论”看中国古代史论,结果是中国古代史论溢出“历史理论”之外,这已经暗示出中国古代史论的独特价值。

而反观“历史理论”,则由不得我们不产生这样一些基于中国古代史论而提出的追问:“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中是否也具有类似于东方史论这种整体性的面貌?就个别问题(如哲学与方法是否统一、是否根植于某种传统,等等)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但是,似中国古代史论那样将各种问题融合于一体,“历史理论”则殊难相类。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理论”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很少涉及体裁、文学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中的位置等问题,在内容上不似中国古代史论那般丰富,由此,中国史学界又发展出“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与“历史理论”相提并论,共同承担史学领域的理论建设,而且,“历史理论”出现在西方历史的近现代时期(Modern history),前有中世纪史学,继有后现代史学,后者对前者的颠覆远胜过继承<sup>③</sup>,在时间延续方面显得短促、变幻,不似中国古代史论那般绵长,流波所至,中国学人遂有史学理论“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感<sup>[19]</sup>……可以说,与中国古代史论的整体性相

①伍安祖与王晴佳试图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史学时,选择了中国史学的整体性作为立足点,“试图阐明作为整体的中国史学”(伍安祖、王晴佳:《比较视野下中国古代史学的特征》,《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39页)。这是有见识的。

②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理论”较早来自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乃是科学的工作。”(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③邓京力等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方面指出,“后现代主义挑战历史学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解构及元叙述的解构及其所带来的‘大写历史’的崩塌”,另一方面又补充到,“很多西方史学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恰恰透露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理路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现代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比，“历史理论”的专门性虽然更为突出，但其表现出的局限性与片断感也的确相形见绌。

再以“本末”、“源流”等中国古代思想为例<sup>①</sup>。“本”与“末”或者“源”与“流”对举，体现的是一种对历史事物来龙去脉的纵通认识，这也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特点的认识方法。带着这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当前的史学，可对其“碎片化”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体认：

其一，“碎片化”现象的本质可能是“循流忘源”。多年来，我们埋头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即使研究对象十分具体、边缘、生僻，以至于不同领域间无法交流、对话，我们也总是能够发现足够的研究空间让我们兴致勃勃、不知疲倦地钻研下去。这种情形极其类似于清代章学诚批评末流学术时所讲的“循流者忘源”<sup>[20]297</sup>。

其二，“本末”、“源流”思想提醒我们探求“碎片化”现象的本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处“末”或“流”而问题频出，那么，就应当返回“本”或“源”、在本源之处用力。根据这种思想，我们就应当追问当前史学“碎片化”现象的“本”或“源”在哪里？对此，有学者曾经这样回答：“文革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与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历史学针锋相对、对着干的30年。”<sup>[19]</sup>他指的是，1984年前后我国史学所进行的反思抛弃了前30年史学的一些珍贵遗产（如“史观”或者“理论”）。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史学的“碎片化”现象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对史学理论的反思，来自于这次反思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史学讲求“理论”的背离。这一认识符合事物由本及末、源流有自的发展规律，具有说服力。

其三，“本末”、“源流”思想启发我们进一步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认识史学“碎片化”现象。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前后史学理论的变化虽然可以解释80年代之后史学“碎片化”现象的出现，但是，它不能解释“碎片化”为何像唯物史观传播中的教条主义一样仍旧以一种“理论流弊”的样貌出现。对此，有学者这样理解：“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通惯<sup>②</sup>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薄弱，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细碎

化倾向，将历史研究的目的仅仅理解为重建历史，都可以看作是这个值得反思的传统的现实注脚。”<sup>[21]11-12</sup>这里所说的“值得反思的传统”是指“不能真正地具体研究与宏观的理论概括结合在一起”。也即，当前史学的“碎片化”是研究者理论能力不足的表现。何以理论能力不足？该学者谈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中国现代史学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缺乏具有原创性的历史解释模式和概念系统。”<sup>[21]12</sup>这一看法实际上将史学“碎片化”视为中国现代以来片面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结果，推进了我们对史学“碎片化”根源的认识。不过，这里的认识仍处于自发阶段，与中国古代自觉的“本末”、“源流”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

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我们的启发是连续、深入的，对于我们改善当前史学“碎片化”时所表现出的茫然失措状况有所帮助。

得益于中国传统史学整体性的启示，我们也应当提高对西方史学整体性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整体性认识的不足，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有时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

这里，以我们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为例：“人类理性思维的方式，主要为‘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两种，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问题的研究以‘逻辑的方法’为主，有些以‘历史的方法’为主。逻辑的方法是打破事物原本的时空状态，通过一系列的归类、综合、概括、推理得出抽象性认识；历史的方法是依照事物发展中原本的时间顺序，在自然的时空联系中认识事物。单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主义与思维的‘历史的方法’是一致的，历史学应当特别注重事物的时间联系，所以将历史主义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没有疑义的。”<sup>[22]10</sup>这里将“历史主义”与理性思维方式之一“历史的方法”视为“一致”，非但令人无法明白什么是“历史主义”，反而产生了一堆困扰：

一则，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歧义。如果“历史主义”与两种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一致，则意味着“历史主义”与“逻辑的方法”不一致。换

①《荀子》谈“国计”，有“知本末源流”之谓。明代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6曰：“荀卿‘本末源流’之说，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诚知本之所在则厚之，源之所自则开之。谨守其末，节制其流，量入以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余，上无不足。禹、汤所以遇灾而不为患者，知此故也。”（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非但治国须知本末源流，治学亦如此。清人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9《送陈生伯平序》即有言曰：“良以为学之道，必辨其本末源流。骛末流者，似捷而实迂，探本源者，似迂而实捷。”（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②当为“贯”。

句话说,“历史主义”无需遵照逻辑的方法。这样一来,疑惑便油然而生:不尊重逻辑方法的历史主义靠得住吗?如果“历史主义”不讲逻辑,还要发扬“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岂不荒唐?!

二则,“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是否能够明确区分?恩格斯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采用的方法时,的确提到“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没有对这两种方式加以解释。不仅如此,而且,恩格斯先是指出历史方法的弊端,表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然后又表明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sup>[23]43</sup>,这无疑使得“逻辑”与“历史”两种思维方式颇为纠缠。应该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如果政治经济学无法单纯使用逻辑的或者历史的方式,那么历史学就能单独采用“历史的方法”吗?令人怀疑。

三则,这里忽视了“历史主义”在西方语境中的另外一义,即强调历史学的理论性及其预示性。波普尔讲到:“在这里,我只要说我所指的‘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说就够了。”<sup>[24]7</sup>这样的“历史主义”明显不是“注重事物的时间联系”之义。

综观上述“历史主义”所引发的种种困惑,其症结在于,没有意识到学科与思维方式像物体与元素一样是无法比较的两种事物,但是,其更为深刻的根源恐怕在于,我们未能对“历史主义”等概念所牵涉的文化的整体性产生足够的自觉,对外来的概念与理论存在着轻率的碎片式理解及运用的情形。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精通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曾经谆谆教导:“仔细定义,并且明白这些概念在其本来学术脉络的地位及角色,以及其传入中国学界的历史背景。”<sup>[25]157</sup>

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整体性”并非没有思考<sup>[26]23</sup>。以对西方“知识论”的研究为例。有学者指出,

西方“知识论”对史学和史学理论有着持久的影响: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理本”传统、近代欧洲的“人本”趋向、科学实证主义和专业历史学的产生、反理性思潮对史学的冲击以及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批评,无不与“知识论”有关<sup>[27]</sup>。这里,以“知识论”来贯通西方史学理论,说明西方史学理论自身也有其内在的通贯性,继而,这种以“知识论”为特点的史学理论也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迥异的风格。这正是一种纵通性的整体性的认识带给史学理论的启示。只是,像这样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太少了。学界倾向于认为,多数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通常只是流于浅层的个体研究与流派研究,无法顾及到西方史学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研究深度有待提升<sup>①</sup>。

上述四个示例,即从中国古代“史论”的视角反观“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短时存在、运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本末”“源流”观念反思当前中国史学的“碎片化”、忽视整体的语言文化环境而对“历史主义”形成的似是而非的理解、运用整体性观念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及其“知识论”所提供的启示,都是基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入了解而对当前的若干史学概念或理论产生的批判性认识。在这种古今联系及比较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中国古代史学不同于当前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看到了当前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碎片化存在,看到了语境、文化在中外史学思想交通过程中潜在的制约作用。这对我们促进中外史学理论的高效交流具有启发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自我”与“他者”的敏感与自觉,而这正是理论敏感与理论自觉的前提。

三、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相应概念

近些年,对中国传统史学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是对“史义”的认识。围绕“史义”而呈现出的思想境

①《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的一组文章或多或少都谈到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例如,马宝珠在《接受时代挑战 增强史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中讲到:“但也应该看到,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一些学者对国外史学理论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某些词汇上,如对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内涵理解得还不够深入,如何开展中西史学理论对比尚缺方法。”(第6页)张越《史学理论建设与〈史学理论研究〉》:“此外,无论是对西方史学理论和观点的翻译者,还是研究者,他们对译介和论述对象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的‘历史就是思想史’曾经被许多人挂在嘴边,而真正了解其产生的复杂语境和全部哲学内涵的人则寥寥无几。后现代主义史学亦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与褒扬,然而未曾充分研究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包括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便妄发议论,也是不足取的。”(第11页)

界在今天的史学理论环境中显得非常不同。它衬托出当前史学理论存在着的系列问题。

其一，须知，“史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一个抽象度极高的概念化的表达。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社会。至少自甲骨文时代起，“义”字便普遍存在于各种事物之中，为“史义”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春秋时期，孔子予《春秋》以“窃取”之“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义”的理性自觉的最早的文字证明。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几乎言必提及《春秋》之“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理论源泉，其间所蕴含的“窃取”之“义”更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春秋》之“义”不是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全貌，中国各代史学对《春秋》的依违之间，同时可见其传承性与开创性。六艺（或五经）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文化土壤。“史义”的形式丰富多样，遣词造句、例、传、序、论等皆为表达“史义”的手段<sup>[28]</sup>。统而言之，“史义”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性与整体性。

其二，伴随着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贬抑，“史义”也经历了同样的逐渐湮没的历史际遇。其理论压力主要来自西方的历史哲学。学者在《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一文中指出：“近世以来，中国学人多奉西学以为圭臬，以西学范围和改造中学，遂谓中国只有史学而无历史哲学。余英时先生就曾说过：‘我们的史学尽管发达，而历史哲学的园地却十分荒芜。严格地说，我们缺乏玄想的历史哲学。’类此之言论，实是有以西方之刀叉为餐具而不以中国之筷子为餐具之嫌。”<sup>[5]69</sup>又谓：“柳诒徵先生则独挺中国早有历史哲学，他说：‘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国古亦无此名，而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sup>[5]69</sup>这里同时表达了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学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遮蔽以及柳诒徵对这种遮蔽的抗争。应该说，近代以来，能够在此问题上进行抗争的学术努力一直处于少数状态。

其三，从理论上讲，今天的史学缺少与“史义”相类的相应物。“史义”纵贯中国古代的思想之中，今天则没有这样一个通贯的理论，曾经坚持百年左右的唯物史观，一朝而曲高和寡、门庭冷落，之后的史学理论则与西方史学思潮随波逐流，美名其曰“多元”；“史义”在中国古代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今天的史学理论则与社会实践、史学实践皆相疏远，以

至于需要区分“主流史学”、“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sup>[29]</sup>；“史义”通过“义”将经、史、子、集等思想文化领域融合在一起，令中国人享有“合而不同”的精神世界，今天的史学则学习近代西方科学而强调学科属性，使得史学与哲学、文学等学科泾渭分明，跨学科的结果也往往令人产生词目林立、叠床架屋、头晕目眩之憾；“史义”代表着中国古代史学的价值观，今天的史学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则茫然失绪、争讼不已，对于求真与致用、知识与道德、规律与人文等诸多矛盾不知何去何从……若欲发展史学，则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追求不啻为我们的一面巨大的镜鉴。

其四，需要特别强调，我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关怀可以提升我们对史学价值的思考。我国古代史家为什么前赴后继地探索“史义”？我国古代“史义”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那个让众多史家锲而不舍又难以一蹴而就的“史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开启了对史学价值的深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史学？我们的史学到底应当追求什么？从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史义”有一种高尚的追求，那就是对文化、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早在春秋时期，“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sup>[30]120</sup>而定六经的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sup>[12]84</sup>这里的“道”对于《春秋》而言就是孔子对世道的关切。汉代学人揭其旨云：“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sup>[31]3297</sup>近人冯友兰表达为“阐旧邦以辅新命”<sup>[32]24</sup>。由此，我国古代史学更为关注“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具有“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不尚辟怪，不务繁碎”的优良传统<sup>[33]85-92</sup>，这些都反映出我国传统史学立意高远的非凡品质。有学者通过中西比较曾指出，与古希腊历史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sup>[34]150</sup>，可谓一语中的。正是因为这种品质，我们才得以对史学在当今社会中的担当寄予厚望：“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价值重建的关键时期，传统史学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史学工作者们乃至全社会的重视。”<sup>[35]90</sup>

其五，提高我们的理论能力，帮助我们辨别是非。作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高级概念，“史义”蕴含着深邃的理论思维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有助于我们“理论地”思考当前史学中我们可能称之为“历史哲学”、“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史学思想”等等与“史义”相关的现象或问题。

例如,如何评价今天某些日常化、戏说类历史写作畅销的现象?有文章认为,这类热销的写作因其对历史的文学化演绎、微观历史与人文关怀等特点而受到欢迎,所以我们应当提倡“祛魅历史,返魅阅读”<sup>[36]11</sup>。事实上,有关讨论差强人意。

一则,我国古代史学素来讲究文学性,亦具有人文关怀。这当为共识,无须赘言。

二则,一些讨论没有意识到,此类史学创作在吸引兴趣的同时折损了史学的明智功能。台湾黄进兴先生对此有过明确议论:“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 1989),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竟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总之,‘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知今的功能。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论。”<sup>[37]30-31</sup>一言以蔽之,当代流行的西方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可以创造史学畅销书,却同时也瓦解了史学的真实性及其借鉴价值。

三则,有关史书及评论很少关注深层的历史观念(或者说,忽视对历史观的讨论与建设)<sup>①</sup>。从“史义”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如果我们尚存“史义”意识,文学化、日常化甚至哪怕是还有些人文关怀却浅尝辄止的历史阅读岂能满足我们的思想需求?反过来,“史义”追求却不妨碍史学的通俗性,故有学者指出:“前人关于史义的论述,也适用于通俗历史著述。”<sup>[38]206</sup>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及其“史义”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后现代史学观念的一点启示。通过以上五点论述,我们已经对中国古代“史义”概念的整体性、“史义”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失落际遇、今天的史学不存“史义”的种种表现、“史义”对史学价值尤其是史学与国家关系的强调、“史义”在辨别是非层面的理论能力等诸多方面有所认识。我们认为,今天的史学的确与以“史义”为核心追求的中国古代史学殊为不同,而“史义”观念的确有助于我们在纷纷扰扰的史学现象

中擦亮眼睛。

综上所述三层内容,其意在于反映当前中国史学在概念、整体性、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古今难通、中外隔膜的问题,以及古今联系与比较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若干启示。归根结底,如何正确借鉴外国史学与继承我国史学传统,仍然是当代史学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便是学者所谓中国史学的高下“往往取决于‘自我目光’的敏锐程度”<sup>[39]12</sup>;处理不好,便有“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sup>[40]73</sup>丧失之嫌。在当前中外史学理论被“西方中心论”潜在影响的情形下,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理论精华有助于我们明辨是非,并为我们的史学实现矫枉纠偏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帮助我们树立理论自信。

#### 四、余论

文中诸例,皆为寻常治学时偶然所得,既细微而不碍原作宏旨大雅,又散出而不易自成系统。然而,此一误会中国史学,彼一错解西方理论,真真假假彼此纠缠,总令读者感觉方凿圆柄、理路不通,而对我们的学术理性有所疑虑。所幸有关现象虽然细微零散,但问题并非无章可循,有些问题通过提高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是可以化解的。故不揣冒昧,详陈管见,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再三致意。

通过文中事例,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至少还有以下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其一,须知我国传统史学中存在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发掘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造就理论上的丰富积淀,《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撰述即其成果。而本文所举事例表明,即使处于当代的理论环境中,即使与西方史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依旧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理论的熠熠光辉。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我国近代以来过度批判传统史学的事实进行反思。因为,这种批判导致学界习惯性地忽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

①周一平、许曾会等著《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是目力所及并不多见的一篇结合历史观与文学性的文章。

史研究。”<sup>[41][01]</sup> 这既意味着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只见西方而不见中国,失去了自我,也意味着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沦为史学史研究,未能实现更高的理论层次。

无论哪种意味,它都表达出我们对理论发展不足的遗憾以及对发展理论思维的希望。而文中诸例表明,我国传统史学的思想成就有利于理论思维的提高。

其二,中国传统史学应当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西方史学理论共同致力于未来的史学理论建设。

一方面,随着社会及史学的发展,我们一度非常倚重的西方史学理论暴露出若干不适。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目前主要限于对西方史学理论比较熟悉的学者(有关讨论较多,兹不赘述)。但是,理论资源的单一也将限制有关反思。对西方史学理论之未来的思考一直没有突破,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学界也意识到非西方视角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随着西方传统史学所公认的普世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似乎越来越需要史学家和历史编纂者接受非西方的研究视角。”<sup>[42][38]</sup> 在我国,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呼吁重视中国史学的理论价值,诸如瞿林东以“精神家园”待之<sup>[43]</sup>、张广智主张“主体意识”<sup>[44][55]</sup>、汪荣祖提出“另外开创一番中国史学的大事业”<sup>[45][21]</sup>、陈支平则称“命题话语权”<sup>[46]</sup>、葛志毅重视“中国文化托命之本”<sup>[47]</sup>等。学者指出:“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中西史学的比较,其所获得的历史意识无疑会更为深刻,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比较历史研究的作用。”<sup>[48][68]</sup>

总之,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不能取代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不应被边缘化。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维作为对自身传统的自觉,不仅在整合、复兴传统史学的时代使命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对于纠正那种生硬植入、自说自话、与传统史学疏离的西方史学理论偏好,对于更加合宜地、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和深化西方史学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更应尊重历史的延续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拿来主义”。揆诸古今,方能明辨中西。

[责任编辑 李卫民]

####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文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02).

[3]汉语大辞典:第五册[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

[4]汉语大辞典:第三册[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

[5]王达三.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J].温州大学学报,2006(02).

[6]乔治忠.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J].中国史研究,2017(02).

[7]侯旭东.能否设立一个“公共史学奖”[N].中华读书报,2015-05-27(009).

[8]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J].史学史研究,2004(03).

[10]刘知幾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1]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孔子著,黄怀信校释,庞素琴通检.论语新校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3]商鞅等著,商君书译注:第2卷[M].周晓露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4]班固.汉书:第2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6]邱濬.世史正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7]刘家和.传承与创新与历史和史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02).

[18]佐藤正幸撰.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J].卓立,陈菲译.山东社会科学,2008(08).

[19]王学典.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的思考[N].中华读书报,2015-03-18.

[20]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彭卫.原创性的历史解释模式——寻找史学理论进步的突破口[J].史学理论研究,2010(03).

[22]乔治忠.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J].郑州大学学报,2004(01).

[2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卡·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何林,赵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5]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J].人文杂志,2010(02).

[26]张广智.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

- 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J].探索与争鸣,2013(07).
- [27]陈启云.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02).
- [28]廉敏.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J].文史哲,2018(02).
- [29]王记录.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面貌及发展态势[J].山西师大学报,2013(04).
- [30]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31]司马迁.史记 第13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2]曾昭式.“旧邦新命”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观念的转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03).
- [33]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4]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J].史学理论研究,2015(03).
- [35]许兆昌.传统史学与价值认同[J].史学集刊,2013(06).
- [36]吴锡平.“另类”史学的魅力解读[J].社会观察,2007(01).
- [37]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J].历史研究,2013(05).
- [38]周文玖.“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J].学习与探索,2011(01).
- [39]王天根.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J].安徽史学,2011(05).
- [40]苏全有.魏源之“师长”说中的“制民”成分——兼论史学研究中的盲点与范式[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03).
- [41]周祥森.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2013(04).
- [42]伍安祖,王晴佳.比较视野下中国古代史学的特征[J].史学理论研究,2013(04).
- [43]瞿林东.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05).
- [44]王海燕.世纪之交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8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报道[J].史学理论研究,2015(01).
- [45]宋学勤.“梁启超式的输入”的真意义——兼论中西史学文化的接轨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2).
- [46]陈支平.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J].文史哲,2011(04).
- [47]葛志毅.史学为中国文化托命之本[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0).
- [48]王成军.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观及其在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价值[J].史学理论研究,2013(04).

##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ompari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 Refle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oday'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an Min

(Institute of Theory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That is, some current conceptions of historiography cannot reflect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 integr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reflects the fragmentation of current historical theory, the current historical theory lacks a corresponding concept which can compare with "Shi Y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se three problems cut of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nk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ill not be conducive to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y following China's own path. So we should us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s a theoretical resource,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theory; a theoretical resource